



马克思恩格斯的古代史素养及 方法论贡献*

甄修钰 张新丽

【摘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倾注毕生心血研究资本主义的同时,为何花费大量精力去研究古代史,这显然不是一个纯学术爱好的简单问题。考察他们研究古代史的语言素养及毕生重视古代史研究的概况,分析他们研究古代史的方法论及其贡献,可以充分认识他们研究古代史方法论的重要指导意义,有助于我们解决困扰古史学界的一些复杂问题。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古代史素养 方法论及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倾注毕生心血研究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古代史的研究,马克思甚至在晚年不惜放弃《资本论》的写作,在年迈体弱的状况下写下数量惊人的“古代史笔记”。恩格斯为了完成马克思的遗志,写下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古代史理论显然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课题,特别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至今仍困扰着学术界。因此,本文只是借助库济辛^①等人的研究成果,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古代史方面的素养及他们进行古代史研究的概况;他们研究古代史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他们研究古代史方法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古代史素养及研究概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有非常好的研究古代史的语言素养,而且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同时花费很大心力来研究古代史。

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认真研究古代文学和历史,他在拉丁文作文考试时,写了《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该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一文。^②

在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证书上,说他的拉丁文是:“该生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较容易的地方,不经准备也能熟练而严谨地翻译和解释;如经过适当准备或者稍加帮助,即使对较难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不是在语言特点而是在内容和思想联系方面难于理解的地方,也常常能够做到这一点。……他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的学术史和方法论研究”(13BSS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库济辛(В. И. Кузицин, 1930—2013)是莫斯科大学历史学功勋教授、古典经济和文化史专家、俄罗斯《古史通报》、《历史问题》、《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集》的编委。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页。



在口语方面,达到了相当令人满意的熟练程度。”在希腊语方面,“他的知识和他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的理解能力,差不多和拉丁语一样好”。^①

在大学时代,马克思不仅听了权威学者有关“荷马问题”和“欧里庇得斯”的讲座,还摘录过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和莱辛的《拉奥孔》这两本当时古代文化的代表性作品,还把塔西陀、奥维得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译成德文。^② 马克思在大学时代还加入过青年黑格尔派,即“年轻博士俱乐部”,系统地研究了古希腊哲学。1841年,马克思完成了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库济辛认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是偶然的选题和研究,这与他热爱古典文化及他的古典史素养显然有一定关系。^③

恩格斯因特殊情况并未读完中学,但他的肄业证书上有关古典语言掌握程度的评价也非常高。就拉丁文而言:“他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无论是散文作家或诗人的作品,特别是李维和西塞罗,味吉尔和贺拉斯的著作,因而能毫不费力地理解整体的联系,清晰地掌握其思路,能熟练地把拉丁语课文译成德语。”就希腊语而言:“他已充分掌握词法和句法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学会了熟练灵活地翻译比较容易的希腊散文,如荷马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而且能较好地理解和复述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中的思路。”^④

恩格斯也未读过大学,只是利用他服兵役的空闲时间到柏林大学旁听过哲学课。但恩格斯是自学成才的典型。1839年,他从来梅给在巴门的妹妹玛丽亚的信中提到,“趁这个机会我学习了土耳其语和日语,这样我就懂得25种语言了”。^⑤ 这就是说,恩格斯在19岁时就已经懂得25种语言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后,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和古代史的需要,继续进行古典语言和其他语种的学习。据拉法格说,马克思“每年都要把埃斯库罗斯作品的原著读一遍”。^⑥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阅读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摩斯提尼、普鲁塔克、德谟克利特、西塞罗、狄奥尼修斯、李维、辛尼加、科路美拉以及许多其他古典作家的著作”。^⑦ 同时还阅读了博克、布彻尔、格罗特、尼布尔、蒙森、古郎士、库尔齐乌斯等许多古典史学者的著作。^⑧ 由于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学习和钻研过一千五百多本书,而许多书籍都是外文的”^⑨,说明他懂得许多种外语。据拉法格说,马克思“能够阅读欧洲一切国家的文字,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而且写得非常好,使精通这几种文字的人称赞不已”。^⑩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学俄语时已经50岁了,52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2—933页。

② 格·伊尔尼茨、狄·吕布克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陈世夫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③ Кузицин В. И. К Маркс об Антич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ВЕСТИ МОСК УН-ТА. СЕР. 8. ИСТОРИЯ, 1983. № 5.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7—548页。

⑤ 马中平:《恩格斯是怎样学习外语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⑥ 格·伊尔尼茨、狄·吕布克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陈世夫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⑦ Кузицин В. И. К Маркс об Антич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ВЕСТИ МОСК УН-ТА. СЕР. 8. ИСТОРИЯ, 1983. № 5.

⑧ Кузицин В. И. К Маркс об Антич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ВЕСТИ МОСК УН-ТА. СЕР. 8. ИСТОРИЯ, 1983. № 5.

⑨ 马中平:《马克思与外国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⑩ 马中平:《马克思与外国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时已经取得显著效果。恩格斯为此在 1870 年 1 月 19 日写信表示:“我祝贺你在俄语方面取得的成绩”^①。

恩格斯虽然在 19 岁时就懂得 20 多种外语,但他仍然重视外语的交流与学习。他为了批驳巴枯宁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骗人鬼话,于 1852 年学会了俄语;19 世纪 60 年代,他学习了斯堪的那维亚语言和 中东地区的语言;80 年代末,70 多岁高龄的恩格斯又学习了罗马尼亚语、挪威语和波兰语。^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特别重视古代史的研究。19 世纪 40 年代,在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他们用思辨的方式阐述了“部落所有制”以及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问题。50—60 年代,他们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研究了印度、波斯、中国等地区的古代史。尤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专门写有《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其中对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的异同,它们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关系的分析十分详细。70 年代以后,如前所述,马克思不惜放弃《资本论》的写作,在年迈体弱的情况下写下了数量惊人的有关毛勒、科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等人著作的“古代史笔记”。恩格斯不仅在 80 年代写有《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法兰克时代》等文章,同时他为了完成马克思的遗愿,写下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非常好的语言素养,所以尽管当时的资料特别缺乏,但他们仍然重视古代史的研究,并在古代史研究领域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古代史的方法论及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对古代史有大量分散的论述,也留下一些集中的专门研究成果。全面研究这些论述当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得了的,这里只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他们的贡献。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界古代史领域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农村公社及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为切入点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

在 18 世纪,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曾提出人类初期有过一个“自然状态”的观点,所以在“18 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虚构,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实状态”。^③ 但到 19 世纪,除亚当·弗格森和圣西门等人认为公有制先于私有制外,西方大部分学者仍然顽固坚持“私有制永恒论”,他们不仅有意回避对农村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的研究,而且把史前史排除在研究之外。“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他们却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解释。”^④ 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缺乏实证材料的情况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哲学思辨的方式论证人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第 412 页。

② 马中平:《恩格斯是怎样学习外语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1 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2 页。

社会最初的发展阶段是“部落所有制”。在俄罗斯和亚洲地区发现农村公社的实证材料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研究这些地区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及其特征。他们认为,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实际就是农村公社不断瓦解、私有制代替公有制、进而大土地所有制逐渐代替小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①1857年至1858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以源于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为切入点分析了有代表性的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形式,认为它们是形式不同、本质相同,都是“以公社成员身份为中介的所有制”。^②它们分别是东方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西欧封建社会早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它们的解体过程也大为不同:亚细亚的所有制是长期残存,“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③古代的所有制残存到“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④日耳曼的所有制甚至到19世纪时在马克思的家乡还“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或者说还存在着“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⑤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古代史的方法论与当时西方学者的方法论截然不同,他们研究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是从分析农村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开始的,这与他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一样,都有一个切入点和方法论,而这正是同时代西方学者有意回避的关键点。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古典史领域的贡献主要表现为研究奴隶制社会的方法论和揭示了奴隶制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西方学者把古典社会或者视为封建社会,或者视为近似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在古史现代派的笔下,古代奴隶制与近代奴隶制相同,古代无产阶级与近代无产阶级相同、古代殖民与近代殖民相同。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有关古典古代的一些实用百科全书中,可以看到一种谬论,在古代世界,资本就有了充分的发展。”^⑥即使像蒙森这样著名的古典史学者,也把“任何货币经济揭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⑦。马克思指出:古代人的剩余产品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即使这样做过,至少规模也极有限。(古代人盛行本来意义上的财宝贮藏,这说明他们有许多剩余新产品闲置不用。)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的和公共的建筑。他们的生产更难说是建立在解放和发展物质生产力(即分工、机器、将自然力和科学用于私人生产)的基础上。总的说来,他们实际上没有超出手工业劳动。”^⑧由于古代人没有生产过剩,只有消费过度,因此,“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营生;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才超过这些民族而空前绝后”。^⑨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所构成的生产过剩与古典社会的商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注①。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9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货币经济做了严格区分。至于古代无产阶级与近代无产阶级的区别、古代殖民与近代殖民的区别,马克思区分得更为精练:“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①古代殖民是“人口压迫生产力”;现代殖民是“生产力压迫人口”^②。

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非常消极地看待古典社会的奴隶制,他们把较为先进的雇佣制与落后的奴隶制相比较,认为奴隶制经济是一种有极强破坏力的经济。^③马克思认为,奴隶制“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④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⑤

对于奴隶制的社会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复杂的历史事实简单化,反对把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特点和实质绝对化。^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1872年)中明确指出:“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共同体在其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1894年)中同样指出:“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民族中,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处论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即在古典社会的全盛时期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奴隶制经济,而是表现为积极公民所有制的小农经济。或者说,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之前,古代的所有制虽然占主导地位,但有不断衰落趋势,最终被奴隶制破坏;奴隶制在当时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有不断发展之势,并最终确立。同样,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之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而是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⑨恩格斯也指出:“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页。

③ В. И. Кузищин, К. Маркс об Антич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8 история, 1983. № 5.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⑥ В. И. Кузищин, К. Маркс об Антич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8 история, 1983. № 5.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1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467页。

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①当然,这种为土地所有权而进行的斗争具体来说就是“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并“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②这表明,古典社会不仅公民所有制的发展受奴隶制制约,而且其社会矛盾也为奴隶制所决定。因此,古史现代派和奴隶制消极派的方法论显然是不科学的。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亚洲地区的古代社会同欧洲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进行简单类比。

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的这种社会“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只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③因为,“在亚细亚形式下,……奴隶制在这里既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④所以亚细亚所有制“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⑤,尽管“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⑥这表明,在马克思笔下,东方古代社会不存在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与积极公民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勉强度日”的公社长期保留着完整的图样,形成一种“普遍奴隶制”社会,但“普遍奴隶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社会,因为除皇帝一人自由外,王公大臣等非劳动者及各阶层的所有劳动者都是专制君主的奴隶。

在马克思看来,亚洲地区的古代社会也不同于欧洲的封建社会,不应像科瓦列夫斯基那样把两者进行机械类比,因为欧洲封建社会有以下本质特点:第一,农奴制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而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第二,“罗马-日耳曼封建主义所固有的对土地的崇高颂歌(Boden-Poesie)(见毛勒的著作),在印度正如在罗马一样少见。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第三,“大莫卧尔帝国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即没有西欧封建主那种世袭司法权或领主司法权,而“柯瓦列夫斯基自己也看到了”它们之间这个“基本差别”;^⑦第四,“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⑧

这样,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不仅可以看到东方古代社会与西方古典社会的明显差别,也能看到东方古代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不能做简单类比的方法论。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古代史方法论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尽管古代史资料极为贫乏,苏美尔文明、哈拉巴文明、爱琴文明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43—14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74页。

不为他们所知,有关亚洲地区的古代史资料基本上都是第二手资料,因而他们对古代史的一些论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诸如亚洲地区在进入阶级社会时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研究古代史的方法论对我们的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源于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为切入点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不仅提供了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在本质上都是源于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的方法论,而且还提供了从四个方面区分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方法论。

第一,从所有权来看,三种所有制是“把大地当作劳动的个人的财产来看待的关系”^①,或者说是“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②,也可以说是“劳动的个人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③。至于奴隶制和农奴制,“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所有者”^④,或者说劳动者还无权把土地视为自然条件,只能把自己的身体视为自然条件,劳动本身则不归自己所有。

第二,从共同体来看,三种所有制都以共同体为“第一个前提”或基础,而且是“以公社成员身份为中介的所有制”。^⑤ 奴隶制和农奴制正好相反,它破坏了共同体,改变了共同体,奴隶和农奴被人占有,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⑥

第三,从财产形式来看,三种所有制都是财产的最初形式或原始形式^⑦;而“奴隶制和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⑧

第四,从生产者和生产的目的来看,三种所有制的生产者都是共同体的成员,“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或者说是“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⑨。奴隶制和农奴制则不同,生产者是奴隶和农奴,生产的目的是为“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服务的,“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⑩

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特别强调的日耳曼人使欧洲“返老还童”和“白白渡过四百年”等论述来看,由于罗马帝国及其奴隶制走上了绝路,西欧早期封建社会仅以罗马因素——隶农制是难以确立封建制度的,它必须与日耳曼因素相结合,即经历一个马尔克解体及大土地所有制代替小土地所有制的历史进程。

不难看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不仅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是并列关系,奴隶制和农奴制实际上也是并列关系。因此,古代东方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实际上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4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4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46—147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3、147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47页。

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或者说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和西欧封建社会的农奴制只是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的关系,而不是在逻辑上有依次演进的关系。这就有助于我们反思奴隶制社会必然演进为封建社会的逻辑关系,也有助于我们分析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等在进入阶级社会后为何走的是封建化道路,而非奴隶制社会的道路。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古代东方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异同的方法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农村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但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的解体进程并不完全相同。在古代东方社会,公社及其亚细亚所有制是长期残存的,图样保留完整;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公社及其古代所有制或公民所有制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之后被奴隶制破坏;在西欧封建社会,公社或马尔克及其日耳曼所有制历经四个世纪后,在9世纪被农奴制破坏。因此,不能把未被奴隶制破坏的“普遍奴隶制”的东方社会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进行简单类比;也不能把长期残存公社的东方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进行机械类比。或者说,研究古典社会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方法并“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由于“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做王公的营垒,看做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①所以,古代东方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西欧封建社会虽然都是同农村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这种把共同点和不同点相结合的分析世界古代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反思“五种生产方式理论”,重建世界古代史体系;有助于我们摆脱古史分期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困境;有助于我们深入讨论东西方古代文明在社会经济形态方面的异同。

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重视研究古代史的动因和严谨的治学方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古代史资料还极为贫乏的情况下,不仅重视有文字以来的古代史的研究,同时也特别重视史前史的研究。尤其是马克思,如前所述,在他的晚年不惜放弃《资本论》的写作,在年迈体弱的情况下写下数量惊人的“古代史笔记”。恩格斯为了完成马克思的遗志,写下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重视古代史的研究,其动因是什么?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在学术上的“慢性自杀”,即马克思意识到自己走了弯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错误理论”,只好通过研究古代史来度过晚年。苏联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学究气”,因为中断《资本论》的写作,在晚年高龄抱病的情况下,花那么多时间系统地、详细地做有关古代史的摘记,仅仅“对马克思传记作家们”有用,仅仅能表明马克思“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了扎扎实实、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1页。

② 杜智章:《国外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需要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体系,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显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重视用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丰富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并不是到了晚年才特别重视古代史研究。不存在什么“走弯路”或要放弃早先“错误理论”的情况,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古代史是唯物史观这个宏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毕生重视研究它,并利用新成果来纠正过去的某些提法,如纠正“氏族是家庭的扩大”这一错误,进而丰富和发展他们的理论。

目前,对不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知的苏美尔文明、哈拉巴文明、爱琴文明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从历史实际来看,苏美尔文明的乌尔第三王朝显然是标准的奴隶制社会,而不是无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奴隶制”社会。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利用第二手资料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研究古代史的方法论已经过时。林志纯先生在他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一书的前言中,就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古代史的方法,专门分析过“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和“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这两个核心问题^①。他认为,苏美尔在早王朝时代就有了土地买卖,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土地私有制确立较晚,前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后者在公元前111年。因此,“只要自耕农民阶级尚未彻底破产,尚未完全被奴隶所排挤,经济基础总还不是奴隶制经济,而仍然是小农经济”。^②这样,东方社会在进入阶级社会时没有土地私有制这个结论显然应当纠正。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农村公社为切入点,研究私有制破坏公有制、大土地所有制破坏小土地所有制的方法并没有过时。

此外,使走上绝路的古代社会“返老还童”的也不限于日耳曼人。在苏美尔文明、哈拉巴文明、爱琴文明之后,阿摩利人、雅利安人、多利安人对他们所生活的地区也具有“返老还童”的作用。那么,他们所建立的新社会是什么性质?与已经灭亡的旧社会的性质是否有本质不同?是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还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要把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并列对待?为何要把奴隶制和农奴制并列论述?深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古代史的这些方法确实有助于我们解决目前困扰古代史学术界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而建立科学的古代史理论体系。

总之,世界古代史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丰富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所创立的研究古代史的方法论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甄修钰,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

张新丽,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邮编:010070)

(责任编辑:于 沛)

(责任校对:吴 英)

① 林志纯主编:《世界上古史纲》(上册),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9页。

② 林志纯主编:《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15、17页。